

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执行问题研究

——以《新加坡调解公约》为视角

汪文璟

(武汉大学 国际法研究所,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新加坡调解公约》的通过为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跨境执行搭建了法律框架,也意味着限制调解成为国际商事争端主要解决方式的障碍得以消除。实践中,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执行涉及确定执行管辖权、明确执行条件和规范执行程序等诸多问题,通过分析《公约》制定过程中的立法动因并借鉴国际商事仲裁的相关做法可以使相关问题一一明晰。同时,为了使《公约》在中国真正“落地”,我国应借加入《公约》之契机,加快商事调解立法进程,设立专门机构审查和解协议内容,推动个人调解机制的发展,并加强对虚假调解问题的规制,以期优化国内营商环境、维护商事主体利益,促进我国商事调解事业发展。

关键词:新加坡调解公约;和解协议;执行;个人调解;虚假调解

中图分类号:D997.4;F7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0625(2024)02-0029-07

一、引言

在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UNCITRAL)(以下简称贸法会)的主导下,经过四年的精心策划,《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greements Resulting from Mediation, Singapore Convention on Mediation)(又称《新加坡调解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于2018年12月通过并自2019年8月7日开放签署。《公约》已于2020年9月12日正式生效^[1],截至2024年3月15日,已有包括新加坡、沙特阿拉伯和日本等国在内的14个缔约国^[2],中国作为首批签约国签署了该公约。

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跨国商事活动发生争议的情况不断增加,而这些争议的解决面临着诸多挑战,包括但不限于不同国家间法律体系的差异以及跨国争议解决的成本等问题。诉讼、仲裁和调解是国际商事争议解决领域的“三驾马车”。诉讼和仲裁分别以《选择法院协议公约》(Hague Convention on 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s)和《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Convention on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Arbitral Awards)(以下简称《纽约公约》)作为跨境承认和执行的国际法依据,《公约》的出台弥补了调解产生的和解协议跨境执行依据的缺位。和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历来是调解作为独立争议解决方式的生命力所在^[3]。《公约》建立的和解协议“直接执行机制”的实质就是让缔约国的公权力为和解协议的跨境执行提供保障,通过对“不认账”的一方强制执行来救济另一方,以确保和解协议的效力以及执行结果的确定性,以此基本消除长期限制调解作为国际商事争议解决方式的关键因素,在国际商事调解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4]。

为吸引具有不同法律体系的国家加入,并向具备不同调解经验水平的司法管辖区提供统一的和解协议跨境执行标准,《公约》采用开放、灵活的措辞以提高国际接受度,但随之而来的是对《公约》条款解释上的差异问题。因此,明确一些高度概括且抽象的术语及条款的释义对于促进《公约》的理解和适用至关重要。同时,作为一个面向所有国家的纲领性文件,《公约》的作用仅限于为和解协议的执行提供统一法律框架,实际执行层面仍需缔约国内部立法和程序予以

收稿日期:2024-02-01

作者简介:汪文璟(1999—),女,安徽黄山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私法。

配合^[5]。

本文详细分析了国际商事和解协议在跨境执行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确定执行管辖权、明确执行条件以及规范执行程序,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公约》与中国法律制度的衔接,以期对中国商事调解事业的发展有所裨益。

二、确定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执行管辖权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国际商事活动的增加不可避免地引发了更频繁的商事争议,解决机制的有效性因而成为维护国际贸易秩序和促进经济合作的关键因素。《公约》的制定,旨在提升经调解产生的国际商事和协议的可执行性,从而加强调解作为解决国际商业争端手段的适用性和有效性。然而,《公约》未明确被请求救济方的主管机关如何确定执行管辖权,作为一个框架性文件,将具体的执行管辖权的确定留给各缔约国通过国内法律作进一步精细化处理。目前,我国尚未出台有关和解协议执行管辖权确定的相关规定。鉴于国际商事仲裁与调解在解决国际商事争议上具有相似性,均属于广泛采用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且是一些民间机构和贸法会等准公共机构所通过的各种详细程序规则的主题,并且考虑到贸法会已制定关于仲裁和调解的示范法,在缺乏国内调解立法的情形下,和解协议执行管辖权的确定可以适当参考仲裁管辖权的确定方法。

(一)对外国仲裁裁决有管辖权的法院的确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4 年版)(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条,若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由我国涉外仲裁机构作出的仲裁裁决,对方当事人可以向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该规定明确了两个关键要素:其一,申请人仅限于当事人;其二,受理法院为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财产所在地中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扩大了对外国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的管辖范围,规定若外国仲裁裁决的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财产所在地均不在我国的,受理关联案件的法院或受理关联案件的仲裁机构所在地法院有权管辖,客观上使更多的外国仲裁裁决有望在中国得到承认与执行。

(二)对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有管辖权的法院的确定

鉴于国际商事调解和国际商事仲裁在结构上的

相似性,和解协议执行管辖权的确定可以借鉴仲裁领域的实践,即由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财产所在地中院管辖。此外,为提高国际和解协议被执行的可能性,建议适度扩大管辖范围,对于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财产所在地均不在我国的情形,允许受理关联案件的法院或仲裁机构所在地法院行使管辖权。此项建议意在借助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跨境商事纠纷方面的专业能力和经验,确保国际商事和解协议能够得到更为有效和公正的审查与执行。此举不仅扩大了执行管辖的范围,也确保了处理程序的高效性和专业性,进而提升了和解协议执行机制的整体有效性。

三、明确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执行条件

在国际商事争议解决过程中,调解作为一种高效、灵活、保密性高的争议解决机制受到商事主体的青睐。该机制提供的非对抗性解决路径,不仅能够促进双方以协商一致的方式达成和解,同时也减少了对商业关系的潜在损害。然而,和解协议的有效执行是调解机制成功运作的基石。明确的执行条件不仅为和解协议的双方提供了法律保障,还增强了调解结果的可预测性,从而提升了调解这一争端解决手段的吸引力。具体而言,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执行应具备以下条件:第一,必须有一方当事人拒不履行和解协议义务,这反映了和解协议执行的核心目的,即确保双方当事人遵守自愿达成的和解安排。第二,和解协议必须是有效的,有效性是协议得以执行的基础。第三,和解协议内容不得涉及保留条款,以确保和解协议内容明确、便于执行。第四,执行根据必须具备给付内容,确保执行目标的明确性。

(一)负有义务的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义务

如果和解协议的双方当事人自觉履行和解协议,双方间争议自然得到妥善解决,也就不存在和解协议的执行问题。只有当一方当事人拒不履行和解协议的内容时,另一方当事人才会为获得救济向相关机关提出执行和解协议的申请,所以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义务是执行的前提。

(二)和解协议必须是有效的

《公约》第一条明确了确保和解协议有效性的基本条件:首先,协议必须具备“国际性”,即和解协议当事人的营业地位于不同国家,或虽位于同一国家但协

议项部分义务的履行地在另一国家,或者与和解协议最密切相关的国家并非当事人营业地所在国;其次,协议必须具有“商事性”。《公约》的调整对象是国际商事争议,非商事案件被排除在《公约》适用范围之外,“商事性”要求有利于跨境贸易的发展^[6]。考虑到各国对“商事”定义的差异,《公约》未对“商事”作出精确界定,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适用阻力。我国在加入《纽约公约》时作出了商事保留,同时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我国加入的〈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通知》中对“商事”一词进行了界定,判断和解协议的“商事性”时可借鉴相关做法;再次,“书面性”也是必要条件。和解协议需采用书面形式或其他可供后续参考的记录形式,包括电子记录等;最后,和解协议必须产生于独立的调解程序。一方面,和解协议需通过调解员协助达成;另一方面,和解协议需源自调解程序,而非通过其他争议解决方式如诉讼或仲裁达成,确保《公约》专注于调解产生的和解协议,避免与1958年《纽约公约》、2005年《选择法院协议公约》以及2019年《承认与执行外国国民商事判决公约》在适用上产生冲突。

(三)和解协议内容不得涉及保留条款

《公约》第八条第1款设立了两类保留。a项针对和解协议涉及公法事项,即当政府机构或其代表作为和解协议的一方时,允许缔约国声明这类协议不适用《公约》。b项规定允许缔约国将“和解协议是否适用《公约》”这一问题交由和解协议双方当事人自行确定,即如果缔约国作出该保留,则和解协议不能自动适用《公约》,只在当事人一致同意时《公约》才得以适用。这条规定也赋予缔约国在《公约》的适用性上更强的保护。要求当事人在商业合同中明确注明援引《公约》,也将帮助培养当事人协商一致的权利和义务意识。

对于上述两种保留情形,本文认为中国在加入《公约》时可以保留情形一,但情形二不宜保留,理由如下:首先,保留情形二的实际意义有限。鉴于调解双方追求的是高效解决争议并维护合法权益,情形二的保留可能削弱《公约》的实用性;其次,保留情形二可能使该条款成为未实际应用的“僵尸条款”。因《公约》提供的强制执行救济对当事人有益,因此选择调解解决纠纷的当事人大多不会排除《公约》的适用。

如果中国保留此条款而实际上很少应用,该保留将失去意义;再次,对该条款的保留会影响涉及中国当事人或其他涉及中国情形下和解协议的有效执行性;另外,一国加入《公约》,《公约》即成为该国法律渊源,当事人应当遵守可执行财产所在地所在国的法律;最后,主张保留“明示适用《公约》”条款的主要考虑在于:未明确适用《公约》的和解协议让当事人是否知晓《公约》成疑,而在当事人不知晓的情况下对其施以更严格的履行义务是不公平的。尤其当一方知晓而另一方不知晓《公约》时,可能导致未经知情方同意下的强制执行,从而造成双方权利义务的不平等。针对该观点,本文认为,当事人作为商事活动的主体,在签订和解协议时应尽到审慎义务,确保了解包括强制执行在内的法律后果。

(四)执行根据必须具备给付内容

执行根据即为当事人援引的和解协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十八条规定,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必须有明确的执行标的和被执行人以及明确的给付内容。此外,《执行工作指导》研究组也认为,执行依据所确定的判项如付诸执行,必须具备“须有给付内容”以及“给付内容应当具体确定”两个要件^[7]。长期以来,我国司法实践采取的是审执分离的做法,法院执行机构通常仅执行载有确定的债权债务内容的生效法律文书。这一做法给《公约》在中国的“落地”造成一定阻碍。

四、规范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执行程序

《公约》创设了和解协议的直接执行机制,简化了传统的外国判决或仲裁裁决的承认程序,直接进入执行阶段。执行程序涉及若干法律问题,包括可提出执行申请的主体、和解协议的审查标准、执行内容、拒绝执行和解协议的理由等,我国需在出台配套立法时具体细化相关规则。

(一)可提出执行申请的主体

执行申请由谁提出这一问题需要我国进一步通过立法予以明确,目前可参考仲裁做法和关于执行问题的具体规定。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2024年版)第290条,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申请只能由当事人作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十七条,生效法律文书

的执行申请应当由当事人提出,该规定同样适用于确定和解协议的执行申请主体。

(二)和解协议的审查标准:形式审查

《公约》第三条规定,本《公约》下的和解协议采用直接执行机制,这意味着执行主管机关主要进行形式上的审查,仅在当事人提出申请的情况下,基于申请的具体内容对和解协议进行有限的实质性审查。简化执行机制的合理性在于:首先,与法院判决或仲裁裁决不同,和解协议的来源国往往难以明确;其次,审查机制的设立可能导致和解协议须通过双重确认才能执行,这与调解制度追求高效解决争议的初衷相悖;最后,鉴于当事人可以对和解协议的执行提出抗辩,来源国的审查成为多余^{[8]27}。

(三)执行内容

根据《公约》第一条,该《公约》充分保障和解协议的约定内容,并未对其中的义务类型作出划分^[9],不论金钱义务还是非金钱义务均可以得到执行,旨在更有效地维护商事主体的合法利益。《公约》草拟阶段,参会各方讨论了是否应将非金钱义务纳入该公约的适用范围。瑞士代表认为,尽管要求履行非金钱义务可能为适用《公约》的法院带来挑战,但这一风险在仲裁裁决中同样存在。限制《公约》适用于金钱义务会严重削弱调解的效益。同时,排除非金钱义务会影响金钱义务的履行,因为这些义务往往相互交织,并且大多数和解协议同时包括金钱与非金钱义务。因此,工作组选择不对和解协议中的义务类型进行区分,以期维护调解的灵活性和协议的整体性^[10]。

(四)拒绝执行和解协议的理由

执行国主管机关可以拒绝执行和解协议的情形主要分两种,一是根据另一方当事人请求拒绝执行,二是主动审查后拒绝执行。

在第一种情形下,被请求执行方需要自行提供证据证明存在下列情形之一:(1)一方当事人处于无行为能力状态;(2)和解协议根据相关准据法无效、失效或无法履行,或和解协议不具有约束力或不是终局的,或和解协议后来被修改;(3)协议中的义务已经履行或不清楚或无法理解;(4)准予救济将有悖协议条款;(5)调解员严重违反调解准则;(6)调解员未向当事人披露可能对调解员公正性或独立性产生正当怀疑的情形。《公约》并未规定如何认定(1)中的“无行为能力状况”,这需要我国根据现有法律体系对《公

约》框架下和解协议当事人的主体资格、权责能力等进行细分规定^[11];鉴于无效的情形众多,且判断和解协议是否具有终局性并非易事,规定(2)事实上赋予了被请求救济的主管机关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在规定的(3)的情况下,主管机关应重点关注当事人是否已完全履行或按约履行;规定(4)对当事人起草和解协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意味着当事人起草和解协议时需要注意协议条款本身的可执行性,以及和解协议条款前后的一致性等问题;(5)和(6)规定的抗辩事由则是调解员的不当行为。《纽约公约》并未特别规定仲裁员的行为给仲裁造成不良影响的后果,而《公约》对调解员的行为作出了限制,即不得违反调解规则或不当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虽然调解过程强调灵活和高效,并鼓励调解员灵活采取各种方式达到争议解决的目的,但调解员的行为仍是有边界的,不应突破法律规定,同时也不应违反当事人意思自治以误导等方式达成协议。

第二种情形是执行国主管机关在主动审查后拒绝执行和解协议,主要包括两个方面:(1)准予救济将违反当事方的公共政策;(2)根据当事方的法律,争议事项无法以调解方式解决。“公共政策”被视为一国根本利益的“安全阀”(Safety Valve)。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基于违反公共政策的理由而拒绝执行涉外仲裁裁决的案例极为罕见^[12],显示了对公共政策适用的严格限制,这一做法也与国际主流做法相符。我国法院在实践《纽约公约》的过程中就“公共政策”的适用问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理解和解协议执行中“公共政策”的适用提供了参考。另外,关于争议事项的可调解性问题,除《公约》明确规定的消费者纠纷以及家庭、继承、就业有关的和解协议不适用的情形外,其他不可调解的情形还需要《公约》各缔约国通过相关法律予以明确。

五、《公约》对完善我国商事调解法律制度的启示

当前我国商事调解实践发展迅速,但相关立法的发展却不尽如人意。由于目前我国尚不存在关于商事调解的系统立法,《公约》与我国现行法律难以有效衔接,商事调解立法迫在眉睫;其次,为尽快与国际调解实践接轨,应推动个人调解机制的发展,而不应局限于机构调解;再次,建议设立专门机构审查和解协议的内容,使更多的和解协议有可能被执行;最后,应重视虚假调解问题,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一）完善商事调解立法

我国尚未形成针对商事调解的综合性立法框架，相关规则散见于《民事诉讼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以下简称《仲裁法》）等法律或行政法规中，且主要聚焦于人民调解、仲裁调解和行政调解，有关商事调解的规定寥寥无几。这一立法现状可能会打击当事人选择调解作为商事争议解决方式的积极性，并对《公约》在我国实施构成障碍。比如，《公约》第五条第1款e项规定，调解员严重违反准则可能导致和解协议被拒绝执行。然而，我国目前并未形成一套统一且权威的调解员行为准则，导致主管机关在评估违规行为时缺乏判断标准；此外，根据《公约》第五条第2款b项，如果争议事项根据寻求救济的当事方所在国法律无法以调解方式解决，则该当事方主管机关有权拒绝救济。我国《仲裁法》明确规定了不适用仲裁的案件范畴，但我国尚缺乏一部专门的调解法来规定不能适用调解的情形。除了遵循《公约》的文件要求外，和解协议执行过程中如何与国内法院程序衔接、如何确定管辖权以及调解员应具备何种资质等问题均需通过专门立法予以规定。

我国商事调解事业刚刚起步，尚不具备批准《公约》的条件，但从长远来看，我国致力于参与构建国际民商事争议解决体系，寻求通过批准《公约》来促进商事调解制度的完善、提升涉外商事争议解决能力，并支持开放经济体制的发展，所以我国存在批准《公约》的必要性^[13]。又由于我国的商事调解制度与《公约》之间没有根本性法律冲突，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执行机制与我国现有涉外民事执行制度具有兼容性；此外，由于我国商事调解制度正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很大的调整空间，所以我国也具有批准《公约》的可行性。为促进将来《公约》在中国真正生效，我们必须先做好国内配套法律法规工作。在批准《公约》前的这段时间，国内立法机关应做好制度衔接准备，并制定一部国内外商事争议均适用的调解法，明确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执行细则、管辖权及调解员准则，具体立法可参考《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调解示范法》，也可以借鉴新加坡等国家的调解法。

（二）推动个人调解机制发展

当前我国法律体系仅认可由常设机构作出的调解协议，尚不认可个人达成的和解协议的效力。然

而，这一做法已与国际商事调解实践相脱节。《公约》第二条第3款将“调解员”作为调解主体，强调个人调解在国际商事调解中占据重要地位^[14]。其次，回溯《公约》制定过程，贸法会第二工作组在第65届会议中讨论“‘调解’是否应当限定为一种‘有组织或有安排的’过程”时指出，“有组织或有安排的”这样的用语并不常用于限定调解过程。该限定可能涉及某些成员国国内法的内容，从而降低《公约》对他国的吸引力^[15]。因此，调解不应被限定为机构调解，而应当包括个人调解。我国应借加入《公约》之契机推动个人调解机制在国内的发展，允许具有商事争端处理能力且经验丰富的个人成为独立调解员，认可境内外个人调解达成的和解协议的法律效力，更有效地与《公约》相对接。

（三）建立专门机构审查和解协议的内容

和解协议属于双方当事人合意达成的协议，其内容相较于诉讼或仲裁请求可能更加灵活且富有弹性，涉及权利义务条款出现模糊性的概率增加，附条件、附期限的情形也会更加普遍。因此，有必要对和解协议进行审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六十一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十八条，生效法律文书欲得到执行必须有明确的权利义务主体和给付内容。在我国实行执审分离制度的司法环境下，仅当法律文书明确规定了债权债务内容时，法院的执行部门才会予以执行。因此，依照当前规定，将有大量国际和解协议无法得到执行，这与我国加入《公约》的初衷相违背。本文建议，在法院内设专门机构对执行机关认定内容待明确的和解协议进行适当审查，审查结果作为后续执行依据，进而使得更多和解协议有望得到执行。

（四）关注虚假调解问题

《公约》尚未在我国生效前，我国通过调解程序达成的商事和解协议主要被视为具有民事合同性质的文件^[16]，缺乏法定的强制执行力，所以当事人通过虚假调解获得的不正当利益尚且有限。然而，一旦《公约》得到批准，和解协议将被赋予跨境强制执行力，这不仅显著增强了和解协议的执行效力，也增加了对当事人通过虚假调解达成和解协议的吸引力。我国正处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和完善的关键阶段，且目前尚

缺乏有效监管虚假调解行为的制度框架,这意味着可能出现一系列利用法律漏洞进行虚假调解并在我国寻求和解协议承认与执行的行为。此种情形将对我国司法公信力造成严重损害,并影响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的完整性和效率。因此,我国理论界与实务界应提高警惕,加强对虚假调解问题的研究,在法律制度层面做好防范虚假调解的准备,为《公约》在国内落地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

六、结论

在国际商事争议解决领域,调解以其高效、灵活、保密、自愿以及有利于维持商业关系等特点长期受到广大商事主体的青睐。尽管如此,和解协议缺乏强制执行效力始终是制约调解发展的关键因素。《公约》的出台赋予了和解协议跨境强制执行的效力,开启了国际商事调解发展的新纪元。然而,《公约》提供的是基础法律架构,执行过程涉及的诸多问题仍需各国通过国内法的细化予以解决。

就执行的管辖权而言,可借鉴仲裁的相关做法,

由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其财产所在地中院管辖。就执行条件而言,在和解协议的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义务的前提下,和解协议必须有效,且执行根据必须具备明确的给付内容。在执行程序方面,建议规定当事人作为执行的申请主体,并采用直接执行机制,主管机关原则上只需对和解协议进行形式审查。另外,执行内容应涵盖金钱义务和非金钱义务,并允许主管机关在特定情形下拒绝执行和解协议。

尽管近年来国内多个调解中心相继建立,商事调解实践迅速发展,但相关立法进程却相对滞后,这给《公约》的“落地”带来困难。为使《公约》与我国法律制度更好地衔接,我国应借加入《公约》之契机,加快商事调解立法、推动个人调解机制发展、建立专门机构审理和查明和解协议的内容,并对虚假调解问题进行监督。这些措施有望促进《公约》在我国的有效实施,从而为商事主体提供便利的争议解决途径,推动国内商事调解事业的发展,并优化国内的营商环境。

参考文献:

- [1] UNITED NATIONS. The Singapore Convention on Mediation Enters into Force[EB/OL]. (2020-09-12) [2024-05-03]. <https://unis.unvienna.org/unis/en/pressrels/2020/unisl303.html>.
- [2] UNITED NATIONS. Status: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greements Resulting from Mediation[EB/OL]. (2024-02-28) [2024-05-03]. https://uncitral.un.org/en/texts/mediation/conventions/international_settlement_agreements/status.
- [3] 黄进. 国际商事争议解决机制研究[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0: 253.
- [4] 王芳. 商事调解: 高效解决涉外商事纠纷的钥匙[J]. 人民调解, 2019(7): 33.
- [5] 乔文心. 推动调解解决纠纷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服务新时代改革开放[N]. 人民法院报, 2018-11-7(1)
- [6] CHUA E. The Singapore Convention on Mediation-A Brighter Future for Asian Dispute Resolution[J]. As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19, 2019(1): 3.
- [7]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办公室. 执行工作指导. 2008 年第 4 辑(总第 28 辑)[M]. 北京: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9: 208.
- [8] 孙巍. 《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立法背景及条文释义[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8: 27.
- [9] SCHNABEL T. The Singapore Convention on Mediation: A Framework for the Cross-Border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Mediated Settlements[J]. Pepperdine Dispute Resolution Law Journal, 2019, 19(1): 12.
- [10] UNITED NATIONS. Intervention of the Chair, in Audio Recording: Working Group II, 63rd Session[EB/OL]. (2015-09-08) [2024-05-06]. <http://www.uncitral.org/uncitral/audio/meetings.jsp>.
- [11] 刘潇. 《新加坡调解公约》与我国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衔接[N]. 人民法院报, 2020-02-21(6).
- [12] 宋建立. 公共政策在仲裁司法审查中的适用[J]. 人民司法(应用), 2018(1): 64.
- [13] 许志华. 我国批准《新加坡调解公约》的问题与对策[J]. 中国法律评论, 2023(2): 210.
- [14] 赵平. 《新加坡调解公约》与中国调解法律体系的衔接[J]. 中国律师, 2019(9): 45.

- [15] UNITED NATIONS. Report of Working Group II (Dispute Settlement) on the Work of Its Sixty-fifth Session[EB/OL]. (2016-09-30) [2024-05-06]. <https://documents.un.org/doc/undoc/gen/v16/085/09/pdf/v1608509.pdf?OpenElement>.
- [16] 宋连斌,胥燕然.我国商事调解协议的执行力问题研究:以《新加坡公约》生效为背景[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1):22.

Enforcement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Settlement Agreem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ingapore Convention on Mediation

WANG Wenjing

(International Law Institut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Singapore Convention on Mediation has established a legal framework for the cross-border enforcement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settlement agreements, implying that the factors limiting mediation as a major method of resolving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disputes have been eliminated. In practice, the enforcement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settlement agreements involves many issues, such as determining the jurisdiction of enforcement, clarifying enforcement conditions, and standardizing enforcement procedures. These issues can be clarified through analyzing the legislative motives during the convention drafting process and drawing on related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practices. At the same time, in order to make the convention effectively implemented in China, the country should seize the opportunity of joining the convention to accelerate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of commercial mediation, establish specialized institutions to review the content of settlement agreements,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 mediation mechanisms, and strengthen the regulation of fraudulent mediation, with the aim of optimizing the domestic business environment, protecting the interests of commercial entities,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ommercial mediation industry.

Keywords: Singapore Convention on Mediation; settlement agreement; enforcement; individual mediation; fraudulent mediation

[责任编辑 王七萍]

(上接第 23 页)

in the peak distribution and intra-regional differences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level in the three regions of southern Anhui, central Anhui and northern Anhui. Finally, after decomposing with the Theil index, it is revealed that the overal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digital finance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nhui province mainly comes from intra-regional differences. The northern Anhui region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southern Anhui region and the central Anhui region.

Keywords: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Theil index

[责任编辑 王七萍]